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鲜于浩 著
巴蜀书社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

• 鲜于浩 著 •

留法勤工俭学 运动史稿



巴蜀书社

(川)新登字号 008 号

责任编辑:魏宗泽

封面设计:李文金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

鲜于浩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314 千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80523-666-6/K·137

定价:15.00 元

序

我与鲜于浩同志相识，已近15年。1980年初，就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的鲜于浩同志，奉导师林增平教授之命，乘寒假返川之机看望我和李润苍等同志。其后，林增平教授多次嘱我对他这位开门弟子在学术方面多加指导和帮助。多年来，鲜于浩同志恪守师命，与我在学术方面的交往不断。因此，对其包括这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在内的学术研究状况，基本是了解的。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的研究，涉及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思想史、留学史、政党史、华侨史、中外关系史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运动还在进行之时，即有勤工俭学生提出予以研究之必要。李维汉同志为此于1920年春发表在法国出版的《华工杂志》与湖南衡阳出版的《湘潮》周刊上的《勤工俭学研究发端》一文，就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的原因、实行方法以及同社会进化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索。后来，一些运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也撰写了很多有关回忆，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盛成于193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一书，对运动的兴起、概况、成败等作了论述。不过，直至四十年代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五十年代以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的研究有了较为明显的进展，大陆、港台学者以及日本、美国、法国的汉学家，或撰写专论，或在有关中国留学教育史、中国政党史、中国华侨史等方面的论著中予以论述。一些颇有份量的史料集，也相继问世。

鲜于浩同志利用在法国研修之机，以及在法语、英语方面的有利条件，选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法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等处查阅并自费复印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开始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992年初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准后，又在国内发掘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史料。因此，本书所使用的资料，有不少是初次问世的，这不失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在拥有较为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钩沉爬梳是进行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为了弄清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总人数和分省人数，著者以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所保存的巴黎华法教育会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参照当时国内有关报导，进行了反复的多角度论证，得出了较为合理的结论。留法勤工俭学生1922年后在法国继续学习和转赴比利时等国的情况，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罕有论者涉及。著者以法文档案资料为准，剔除了吴稚晖带至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揭示了1922年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各级各类学校学习的总趋势。著者对法文版《留比同学录》中所列举的二百余名留比学生，逐一翻译核对，初步确认了百余名转赴比利时学习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此外，留法勤工俭学生获得资助的情况，亦为有关论者忽视。著者从大量史料和回忆录中，反复校勘、比较，将大部分省份留法勤工俭学生所获资助的种类、数

额予以较为明确的论述。著者在史料运用方面的认真严肃态度，无疑使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同时也构成本书的又一特色。

既要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更要有所创新。著者不囿于成见，就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的一系列未曾探讨或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法国政府和法国资产阶级对待此一运动及中国学生的态度如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著者在书中既指出法国政府和资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举措，同时也依据客观事实论述了他们对运动和中国学生的支持、资助，从而有利于勤工俭学继续进行的一面。特别是一些法国友好人士对中国勤工俭学生的真诚帮助，更是予以颂扬。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蒙达尼派、勤工派的首脑人物，后来大都成为中共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但是他们在留法期间确曾有过对立和争执，将这些对立和争执的情况予以公正、客观的述评，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著者在书中以史实为据，对两派的争论和联合过程予以合理的说明与解释。留法共产主义小组是否存在及其成员的人数，是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著者在书中确认赵世炎、陈公培、张申府等人在法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所进行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得出留法共产主义小组存在的结论。此外，关于新民学会在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未去法国但对运动有极大影响的毛泽东的言行举措，旅欧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形成及其开展的活动，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在运动中的作为，对运动的评价等方面，著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有这些，体现出本书的又一特色。

总的说来，这部《留学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在史料及其运用以及创新方面，是成功的。著者六年辛劳，全书随处可见。但是，

由于资料的零散与难于收集，本书仍有不足之处，如留法勤工俭学生转赴德国学习的情况，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既然本书名为史稿，表明作者还有继续研究的信心和打算，希望鲜于浩同志不负林增平教授的厚望，不断努力，不断进取。

阮瀛涛

1994年10月于四川联合大学

目 次

序.....	(1)
第一章 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兴起.....	(1)
一、早期留法俭学与勤工俭学实践.....	(1)
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上)	(15)
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下)	(28)
四、赴法热潮概观	(47)
第二章 留法初期的工学实践	(69)
一、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勤工生涯	(69)
二、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82)
三、宣传勤工俭学的团体与刊物	(95)
四、初期工学实践的收获与体会.....	(105)
第三章 挫折与奋争.....	(121)
一、陷入困境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21)
二、勤工俭学生的内部论争与二八运动.....	(135)
三、反对中法实业借款的斗争.....	(150)
四、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163)
第四章 留法勤工俭学的继续进行.....	(184)
一、勤工俭学生的呼吁与多渠道资助.....	(184)
二、留法勤工俭学的继续进行.....	(197)
三、留法勤工俭学生与旅法华工.....	(211)

第五章 中共旅欧党团组织	(235)
一、中共旅欧早期组织.....	(235)
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与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	(247)
三、内部训练与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263)
四、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280)
第六章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失败与成功	(311)
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失败之处.....	(311)
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成功之处.....	(316)
附录:	(330)
1: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名单及其欲入之法国工厂 类型表	(330)
2. 留法勤工俭学生分校名单	(333)
3. 留法勤工俭学生分厂名单	(361)
4. 失工留法勤工俭学生贷款名单	(373)
5.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赵世炎等人的情报	(377)
6. 法国警察局关于邓小平等人从事革命活动的情报	(379)
7.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给予该省留法勤工俭学生补 贴的公函	(382)
8.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给予该省留法勤工俭学生补贴的 公文	(382)
9. 征引参考文献书目	(385)
后记	(391)

第一章 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兴起

一、早期留法俭学与勤工俭学实践

五四运动前后，主要在1919年至1920年，中国大地迅速兴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先后远涉重洋，到法国实行勤工俭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出国留学以振兴中华、挽救危亡，是朝野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中国青年追求新思潮、向西方学习的重要途径。五四时期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正是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远赴异国他乡的。

由于出国留学人数众多，并且在时间和国别方面比较集中，因而能够称之为运动的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热潮，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两度出现：一次是清朝末年的留日运动，另一次即为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清末的留日运动相比较，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发起和组织进行方面有四个突出的特点：它有比较统一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协调机构；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大多是颇有社会影响的在野人士；运动的组织者和倡导者赖以提倡和组织青年赴法留学的机构，是不具有官办性质的民间团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有过长达数年乃至十余年在法国俭学、勤工俭学的亲身经历，以及组织旅法华工实行勤工俭学的社会实践。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大多是清末民初的留法学生，其中以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尤

为著名。李石曾（1881—1973），本名煜瀛，号石曾，河北省高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父为清末大学士李鸿藻。1901年，李石曾与张静江等随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国留学。吴稚晖（1865—1953），本名敬恒，字稚晖，江苏省武进人，系清末举人，曾任天津北洋学堂教习、上海南洋公学学长，亦曾留学日本。吴稚晖是较早倡言俭学的，李石曾赴法离开上海之时，他曾面告李氏，到法国后要“注意苦学，以期广于介绍。”〔1〕二年之后，吴稚晖因“苏报”案被迫流亡国外，到英国留学。他以“素贫贱行乎贫贱”为信条，能寒衣粗食，“在伦敦杂处黑人区域中，残肉劣菜，甘之如飴，所费甚俭。”〔2〕张静江（1877—1950），本名人杰，字静江，浙江省吴兴（今湖州）人，其父曾以十万两银为其捐得江苏二品候补道衔。1901年，随孙宝琦赴法任一等参赞。翌年，开办通运公司，从事古玩、茶叶、丝绸买卖。后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以经商所得为同盟会提供活动经费。1906年，张之同乡褚民谊等人自费赴法留学，通运公司及其下属商店遂为留学生提供食宿、打工的方便，使公司“有若自费生之机关。”〔3〕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省绍兴人。清末举人、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甲午战后，提倡新学，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爱国女校校长兼中国教育会会长等职。后游历日本，参与革命，发起组织光复会并被推为会长。1905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同盟会。1907年，蔡元培在学部编修任上，获准自费至德国柏林留学。在德留学期间，蔡元培虽受孙宝琦赏识，月得津贴一百马克，但仍不敷支用，因而“羈于作工之约（教读及编辑）”，〔4〕以半工半读方式维持留学生涯。

1907年，吴稚晖由英国转赴巴黎，继续苦行僧式的俭学生活。他与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共居陋室，厉行节俭，将日常生活费用减至常人所费之一半；每人每月仅开销房费15法郎，伙食费60法郎。李石曾留学法国期间，先后在蒙达尔纪农校、巴斯德学院及

巴黎大学攻读农科与生物学，遂与留法同人发起远东生物学会。他们应用近代科学研究手段，悉心研究大豆的营养成分，进行大豆食品开发。1909年，李石曾等人筹组了豆腐工厂，后销路渐开，生产规模也渐扩大，工人由5人增至30人。同时，亦有自费留法的学生投身豆腐工厂，进行半工半读。工厂的工人在工作之余，亦由李石曾等人组织，学习中文、法文及科学常识。这样，无论是工人还是留法学生，在豆腐工厂中“同窗同食，略如学校中共同生活之组织，每人每月饭费，40佛郎已足。”〔5〕可见，李石曾开办的豆腐工厂提供了一个较为可行的先例，即以生产企业为依托，解决留法学生的住宿与生活来源，同时又可兼顾学生与工人的学习。这种小范围的、“点”的试验，无疑是成功的。但是，能否将这种试验进行由点到面的普及与推广，显然还取决于两个条件：企业的经济效益能否长期看好；这种能为中国留法学生和旅法华工提供工学便利的企业数量多寡。此外，豆腐工厂进行的是中国式的手工操作，其工艺流程简单，技术要求不高，易为留法学生和中国工人所掌握。如果在近代化的大机器生产企业中工作，豆腐工厂中的留法学生和工人是否能适应，则难以确定，当因人因事而易。

1911年夏，李石曾回到中国。时值辛亥革命的前夕，四川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中国同盟会和会党在各地筹组武装起义，大清皇朝岌岌可危，已经成为同盟会会员的李石曾参与了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活动。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诏宣布皇帝退位。清制既倒，共和肇建，同盟会员的身分、活动完全可以公开，这就为留法俭学会的成立提供了极为方便且又及时的条件。

1912年2月，李石曾与稍后回国的吴稚晖以及张静江、吴玉章、黄复生、汪精卫、张继等同盟会会员一道，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Société Chinoise d'Education Française）。吴玉章

(1878—1966)，名永珊，四川省荣县人。曾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1911年9月，领导成立了荣县革命政权。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科科长。黄复生、汪精卫亦为著名的同盟会会员，他们行刺摄政王载沣的举动，更使其名字妇孺皆知。李石曾约集这些颇有名声的同盟会会员出面成立留法俭学会，使该会名噪一时。留法俭学会在其公启中着重首先阐明留学欧洲的必要性：“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公启还强调了当以俭学方式以达增加留欧学生人数的目的：“惟西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考虑到“女学之进化，家庭之改良，与社会关系尤切，而亦非留学莫济”，他们也同时组织了女子俭学会(Section de Jeunes Filles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ducation Francaise)与居家俭学会(Section de Familles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ducation Francise)。^[6]在同年公布印行的“留法俭学会会约”中，留法俭学会申明其宗旨为“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会约颇为详细地介绍有关赴法的常识、留法的衣食住宿及学习、医疗的概况，以及留法俭学会对有关留法事宜的规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1、留法会员的年龄规定为14岁以上，若由父兄携同者，不限年岁；2、出国备装、旅途、在法食宿和学习，均由留法俭学会组织安排，申明在法住宿为“数人共住一房，每人所占面积约二十(平)方尺”；3、除出国治装费一百元及旅费二百元外，每人每年食宿学费等共计五、六百元；4、至少以二年为预科阶段，学习法语、普通科学、简单工艺技术以准备升学考试，然后可进法国农工实验学校，三年之后可进入巴黎大学等高等院校；5、规定“以科学、实业以及一切有裨人生及有关社会之智、德、体育各种学课为重。

不事政法、军事各科。”在法学习期间，“每日兼作有益人生社会之工艺，以为实习，并稍助经济。”在宣传留学法国的必要性方面，留法俭学会只是泛泛而谈“输入世界文明”、“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尚无系统性，亦缺乏说服力。但在当时人们普遍注意于留学日本之际，特别是清末民初的留日高潮仍呈继续之势时，留法俭学会的成立及其宣传能给人以清新之感。它关于出国前后负责组织衣食住行学习等诸多方面的许诺，容易给人以这是可以信赖的团体的印象。同时，它关于在法国的每年费用“较赴日本留学所费无多”的宣传，对于有能力出国求学的青年及家庭，亦有一定的吸引力。〔7〕

留法俭学会成立两月之后，由该会所办的留法预备学校即在北京宣布成立。其主持人是曾与李石曾一道创办豆腐工厂的齐笠山、齐如山兄弟，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汪精卫等人亦经常至校议事。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大力支持设立留法预备学校，特拨给安定门内方家胡同旧国子监南学作为校舍。学校经费，不由官方拨款，而是自愿募集。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批勇于任事的同盟会员，很快便拟定好简章，着手招生事宜。宣布学校“专为有志赴法留学者而设”，以“养成俭学之习惯”为宗旨。进入该校的新生无须考试，是留法俭学会会员并且遵守留法俭学会会约及学校规则者，均可入学。初定招满20人即可开班，学生总人数不限。学校开设的课程为法文、中文、算学及应用科学。该校采取速成制，学生在校中学习半年之后，经考试合格者，由留法俭学会颁发证书，定期赴法。5月26日，北京留法预备学校正式开学。至当年12月，经由该校学习期满并且合格的学生，已有60余人远赴法国求学，属该校第一班毕业生（实即第一批）。翌年6月3日，为第二班（即第二批）毕业生40余人离京赴法之期，至车站送行者甚多。北京贫儿院贫儿张守正、杨宏远，年仅12岁，亦在此批赴法学生之中，

更受到人们的赞扬。该校还续招了第三班学生，报名者甚多，几百人。

为着培养学生的勤俭习惯，除厨师之外，所有厨房杂活，学生宿舍及校内一切劳务，均规定由学生轮流负责。北京留法预备学校还制订了严格的道德规范和校纪，“禁止一切破坏秩序、妨害公益及其它不道德、不名誉之举动”，上课、自修、进餐、盥洗、体育锻炼等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的位置。与上述规章相辅相成的，是厉行奖惩制度，“学生品行优美，确能遵守章则者，分别情形奖加品行分数。”违犯者，则视情节轻重，予以禁止请假、记过，直至勒令出校的处分。〔8〕

北京留法预备学校的顺利开办，使主持者和筹划者雄心勃勃，他们曾经于1912年11月议及这个学校可容纳学生五百人，“希望于五年内将有三千学生由俭学会西去。”〔9〕如果以学生留学经费从国内汇给为前提条件，那么每年培训并送至法国六百人，已属不少。而且，这个宏大的规划还没有考虑到，留法俭学会曾经宣布的在旅途、在法学习和生活等方面负有组织之责的诺言，以及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动。因此，这个派送三千留法俭学生的筹议，表现了李石曾等人办事冲动、不能长远考虑的一面。

果然，不出一年，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中国国内政局陡然变化。袁世凯以武力打垮了国民党人在南方七省尚存的武装力量，进一步施行专制独裁统治，北京政府为北洋军阀所完全控制。同盟会员大多加入国民党，受到北京政府的排斥、打击。那些坚持反袁统治的国民党人更为袁氏所仇视，不得不流亡海外。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便是在“二次革命”后被迫到法国求学的。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也在这次政治变动中横遭厄运。北京政府教育部先是多次“索还校舍”，逼迫学堂迁入北京四川会馆，继而“警役至校巡查，各生皆退学，校遂停办。俭学会亦不复有多数人（按

指成批地)来法者矣。”〔10〕

国内政治风暴雨过,欧洲形势又突起变局。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为主要战区,祸害尤甚。远离故土的中国留法俭学生,曾经有过一年多的安宁留学生涯。李石曾等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纪、枫丹白露、墨兰等中学,以及一些法国工业、农业学校广泛联系,安排好俭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特别是在俭学生较为集中的蒙达尔纪,定期组织中西学术讲演会、茶话会、音乐讲座,并为年少的俭学生补习国文。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均躬与其事,义务为俭学生服务。各有关法国学校的校长、教员亦热情帮助,大力扶持。战争爆发后,俭学生安宁正常的学习生活便不复存在。不仅俭学生最多的法国东北地区、巴黎地区战事频仍,而且战争期间的邮电、交通受严重破坏,国内汇款时常中断,在法国银行提取汇款、存款均属不易,给俭学生的日常生计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部分留法俭学生颇感恐慌,以“战祸”、“经济”、“停校”为由,提议归国。俭学能否坚持下去,面临紧要关头。

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此关键时刻,发起组织“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安排留法俭学生至法国西南部尚未停课中学、中等专业学校继续学习。驻法公使胡馨吾也予支持,并补助部分经费。在留法俭学生日常生计与学费方面,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可代向中国驻法使馆借用或向法国学校申请缓缴学费,均战后归还、补缴。同时,还规定了每人每月的费用不能超过70法郎,“一切食宿零用及学费均在内。”〔11〕蔡元培以其在青年中的威望,特撰《吾侪何故而欲归国乎?》一文,以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通告的形式发表,说明战祸、经济、停校等困难俱可尽力解决并有眉目,归国川资不如移作留学经费,规劝俭学生在事关“学问之进退者甚大”的归国问题上,“审慎而熟虑之”,坚持留法俭学。〔12〕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所采取的有力措施,终使留法俭学生情绪稳定,偏

安一隅，继续学习。

当留法俭学界度过一战最初艰难困苦的岁月后，一个新的、关于提倡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便被提上议事日程。李石曾仍然是这个计划的始作俑者，他关于普及留法勤工俭学的筹议是在几年实践之后提出的。

李石曾于1909年所创办的豆腐工厂，便有“以工兼学”之意。工厂的30余名工人俱从其家乡河北省高阳招募而来，易于组织管理。在李石曾的安排下，这些工人进行了比较认真的工余学习。同时，一些自费留法学生也进入该厂，从事“以学兼工。”因此，留法勤工俭学在最初的试验中，便有工人、学生两种身分的中国人士分别从事“以工兼学”及“以学兼工。”非常明显，进入豆腐工厂的学生只是将打工作为获取经济来源的手段之一，其最终目的是求学，他们的归宿不可能是豆腐工厂一类的小企业。而豆腐工厂的工人以工为职业，学习是他们获取普通科学知识及提高自身素质的手段。尽管如此，这两种有重大区别的情况，在当时却被统称为“勤工俭学。”蔡元培在作于1915年的《勤工俭学传序》中，对此有明确表述：“俭学会者，专持以俭求学之主义者也。而其中有并匮于俭学之资者，乃兼工以济学。其与豆腐公司诸君，虽有偏重于学、及偏重于工之殊，而其为工学兼营则一也。”〔13〕

能够长期坚持勤工俭学，还是豆腐工厂的工人们，其中佼佼者便在留法勤工俭学界崭露头角了。豆腐工厂的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赴法之前“曾在村中小学与半日学校肄业”，有初等文化程度。在豆腐工厂中，“四年工余求学，娴熟法语。乃以半日营商，半日求学。”〔14〕后来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和科学知识，于1913年创办了地浹泊人造丝厂，又从国内招来华工40余人。该厂循豆腐工厂旧例，仍积极组织工人实行以工兼学。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均到过该工厂参观，并向工人演说以工兼学的好处，鼓励工人工学并进。因种种原因，人造丝工厂开工不久即停办，工